

目 录

辛亥保路运动在仁寿.....	陈汉章 (1)
二刘之战在仁寿.....	陈汉章 (6)
僚人在仁寿地区的活动.....	阙兴建 (10)
民国时期仁寿农工商业概况.....	查学勤 (14)
民国时期仁寿田赋征收及其弊端.....	徐忠稷 李熙 (22)
民国时期仁寿的医药卫生.....	陈汉章 (34)
回忆235师光荣起义的经过.....	王 业 (41)
坛神岩唐代道教石刻.....	郭甫成 (47)
石 鲁.....	和 谷 (49)
踏遍青山——记地质学家黄汲清.....	茅 矛 (98)
高歌事略.....	郭甫成 (113)
毛燮均传略.....	张宣如 (118)
夏良才传略.....	张宣如 (120)
杨嘉良传略.....	朱光汉 (122)
从担担商到企业家.....	黄大钦 (126)
我立志学医的梗概.....	彭宪章 (128)
从医三十二年的体验.....	杨中林 (132)
我的医疗、治学三十年.....	黄新田 (136)
在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开拓前进.....	黄云瑞 (141)
中西医结合的点滴体会.....	郑久安 (147)
学医概述.....	易静之 (150)
踏平坎坷，作生活的强者.....	徐碧仙 (152)
介绍民间骨科医生邱四维.....	李 熙 (158)

辛亥保路运动在仁寿

陈 汉 章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一九〇五年八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它的章程中明确地提出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同盟会的成立，对推动全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清政府的迅速垮台，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起了重大的作用。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不久，孙中山先生以为“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遂派川籍党人余英、熊克武、谢率琦回四川在泸州设同盟会秘密机关，发展同盟会员，联络和组织革命力量。熊克武从成都回井研的途中，曾在华阳与仁寿交界的秦皇寺同秦载赓有过会晤。一九〇六年，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东京召见川南哥老会首领余英，令余回川发动各地哥老会起义。

一九〇八年，仁寿县文林镇士绅李奉三等人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倡导，组织、创建仁寿县同盟会。他们宣传革命宗旨，联络会党及各阶层人士，发展会员。当时，清王朝及其大小官吏的胡作非为与日俱增，对内残民自肥，对外丧权辱国，人民对这样的政府十分愤恨，愿意参加同盟会者颇众，随即在县城黉门旧馆（地址在今仁寿县供销社内）秘密设立了“仁寿县同盟会”，使同盟会的成员开展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活动，为一九一一年九月驱走县令，夺取仁寿县政府

的大权奠定了基础。珠加乡人王子哲（又名安仁）就是同盟会当时在仁寿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辛亥年前先后参加同盟会并作各场镇负责人的，计有陵阳镇（今文林镇）辜青，帅辑五、富加镇李树藩、李郁光，青岗乡黄茨安，宝马乡谢宗农（又名东山）、陈万仞（又名鸣谦），兆加乡万寿山，光相乡李书林、刘子和、李玉山，钟祥乡李熙洲，始建乡黄仁义，彰加乡但稚丞（又名泽霖），汪洋乡（今属大革乡）唐佐辉，禄加乡宋玉先，越溪乡杨海帆，回龙乡肖磊（又名中和），龙马乡张载阳，周龙场李九成，宝飞乡邱志云（又名昂青）。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政府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二十日，又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额达六百万英镑。这样就出卖了两湖境内一千八百公里的铁路所有权，还要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又允许四川享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及展路权。实际上是将全部粤汉川汉铁路拍卖与四国银行团。清政府的所谓“铁路国有政策”是一种“夺路转送外人”，替帝国主义侵吞人民财产的卖国政策，因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在四川境内川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破约保路运动的高潮。六月十七日，川汉铁路部分股东代表根据清政府“商律”中“公司遇有紧要事件，董事局可随时召集股东举行特别会议”的规定，在成都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期间宣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在各州县成立同志分会，四川省咨议局正、付议长蒲殿俊、罗纶被推为正、副会长。不到半月，会员发展已达十万之众，保路运动日益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全省性的川民武装反清局面。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赖天麒（又名伯尊，仁寿禄加乡人），谢育周奉令任讲演员，并被派回仁寿，联络县境内的局、堂、所办事员及社会贤达。于七月十六日在县三费局内（民国时期的征收局，地址在今中共仁寿县委内），开秘密会议，当即投票选举杨景宣（自治所研究员）、王成（禾加乡人）为正、副会长，其余各部门的负责人由到会的局、堂、所办事员及社会贤达自由报名担任。“仁寿县同志协会”成立，会址秘密设在县铁路局（即附设在三费局内）。这次会议，尽管筹备期短，会议准备不充分，但对县境内保路活动的开展壮大了声势。

当时，在成都活动的同盟会负责人龙鸣剑同华阳县同盟会员、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等人商定，以秦载赓的名义，联络各地哥老会首领于八月四日到资州（今资中县）罗泉井召开“攒堂大会”。会上决定了五项行动纲领：一、探查敌情；二、交换情报；三、确定枪、弹来源：起义所需的枪枝、子弹向各该地团练局及富绅私存枪弹中借用，将来归还；四、确定粮饷来源：向各县借用积谷、社谷及其他公共财物，作临时开支，不得向民间摊派，或巧立名目向民众索取；五、严肃军纪：各路发动组织起来的同志会一律改称同志军，推选人员统率，严肃军风军纪。会上，推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川南的起义事项。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于会后分道四出，相机发动起义。同志会派唐宗尧到仁寿、井研、荣县等县联络；陈孔伯、姚孔卓率领井研县一部分义军到仁寿，协助宝飞乡人邱志云（字昂青，原系四川新军管带，因发动新军起义失败后，潜回原籍）在汪洋地区宣布起义。越溪乡人杨海帆又率一百余人到汪洋归邱志云指挥，邱志云单独建

一支“昂青部”开赴偕田；谢宗农、蒋嵩全率部到苏码头统归秦载赓指挥。王子哲（珠加乡人）组织多人参加了刘存厚部。九月七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罗纶等人遭川督赵尔丰诱捕，川人示威反抗，赵尔丰凶相毕露，命令军警镇压，当场击毙三十二人，伤者无数，全川人民义愤填膺，愤怒声讨。

九月八日晨，仁寿、井研等县义军随秦载赓开赴到成都东郊牛市口、大面铺等地与清军战斗；九月九日，侯宝斋率领南路同志军到成都城下，歼灭了驻南郊武侯祠的清军。秦载赓部属仁寿五显场（今景贤乡）人周某所指挥的一个小分队，当时在玻璃厂与清巡防军发生激战。川东、川南两路同志军，经过两天的战斗，击败了清军，控制了成都东南郊区。同志军数万之众在城郊策划攻城，曾血战七昼夜，但由于装备差，缺乏训练，攻城不下。南路同志军首领侯宝斋、周鸿勋在战场上先后阵亡，所率各部义军转入分散战斗。东路同志军退而控制华阳、简阳、仁寿一带，秦载赓等起义领袖赴籍田铺举行会议，再次公推秦载赓、王天杰为华阳、仁寿、井研、荣县、威远等县各路义军的正、副统帅，龙鸣剑为参谋长，同时整编了各路义军，在统一指挥下一致行动。为了牵制成都清军对南路义军的进攻，秦载赓等再次率部，在东路同志军的大旗上，公开打出同盟会的纲领，写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大字，浩浩荡荡地复向成都挺进，转战于中兴场、中和场、苏码头、煎茶溪等地，大小二十余战，因死伤较重，主动转移。东路军是一支由同盟会直接领导的队伍，军纪严明，一路秋毫无犯，沿途百姓无不“扶老携幼、箪食壶浆”，盛情欢迎款

待同志军，所以，军民所至，势如破竹，不久，便攻下了仁寿、资阳、简阳、井研、内江、叙府、犍为、威远、富顺、自贡等十余州县。清政府为之震惊，立即调重兵镇压，兼以各地被打倒了的旧官吏与反动绅商勾结起来，阴谋复辟，东路军便分散活动，相机重整旗鼓，准备决战。

与此同时，四川同盟会主要负责人熊克武派吴玉章（荣县人）谢宗农各返原籍，策动县人起义。谢宗农连夜赶回仁寿，先与县人中深孚众望的刘辑五密谈成功后，约刘平安、刘尊五（都是文林镇人）等多人，商议逼县令交印。遂于九月二十三日，由仁寿同志会众夺了县政府的大权，公推杨道南（始建乡人），出面作仁寿县的自治领袖，主持县事。

四川的保路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其他各省反对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斗争，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孙中山先生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的”。在这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保路运动中，仁寿的同盟会员和参加同志军战斗的群众是献出了自己的力量的。

“二刘之战”在仁寿

陈 汉 章

二刘之战起于一九三二年冬，止于一九三三年夏，它包括成都巷战，荣威大战，毗河、岷江战役，最后，刘文辉失败，退驻西康。这次战争在四川军阀连年内战中，其规模是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军阀混战。双方动员的兵力近三十万，在三大战役中，每战激烈，胜败各方，损失都很严重，特别是给四川民众造成的罪恶甚多，仁寿属重灾区之一，人民惨遭蹂躏，农户十室九空。

刘湘与田頌尧、邓锡侯早有联系，对进攻刘文辉部暗结同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田頌尧、刘文辉部在成都展开巷战时，邓锡侯乘机暗示黄隐师到仁寿籍田铺袭击刘文辉部，但未获成功；黄隐立即联络刘汉雄师偷袭成都红牌楼刘文辉部的防线。成都巷战预示二刘之间的大战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刘荣威大战正式展开。二十四军将冷寅东师集中眉山、井研道上，刘文辉亲赴眉山指挥作战，又将其他部队齐集乐山、仁寿、简阳一线，陈光藻、林云根、张志和集中仁寿，师部设县城，命陈鸣谦旅驻仁寿彰加场。由刘湘指挥的二十军杨森部，四川边防军李家钰部，二十三师罗泽洲部，自资中开赴仁寿，两军在富加镇场口的半边寺激战，罗部伤亡较重，士兵厌战，向周龙场方向撤走，在离周龙场不远的观音滩、踏水桥、倒石桥等地，两军隔河相持两天后，罗泽洲部趁夜黑更深悄悄向资中四眼桥方

面退却。陈鸣谦旅由彭加场乘胜尾追。

二十一军刘湘亲驻自贡督师，十二月十日，刘湘部唐式遵师由自贡直驱井研，向仁寿进攻，在井研东林场与冷寅东师遭遇，双方混战三日。刘文辉指挥冷寅东、陈光藻两师反攻荣县、威远。陈光藻部在仁寿、井研、荣县交界的松峰场与二十一军范绍增、王缙绪两师在离松峰场不远的铁炉场又激战两日，双方官兵战死两千余人，伤者更众。据目睹者、现松峰街上的老人称：当时万寿官坝子内，遍地躺满伤兵，有的全身泥、血难分，一息奄奄地倒在地上，有的呻吟不止，无人护理，其惨状使人怵目惊心。范绍增、王缙绪两师损失颇重，被迫撤退，陈光藻师乘胜追至威远，命王元虎旅长率兵力七个团由松峰场问道进攻威远五里浩兼程进击荣县，在荣县城内擒获二十一军前敌指挥官鲜英。这时，战局对二十四军甚为有利。刘湘见战况逆转，即派与刘文辉素有交情的杜少棠持刘湘亲笔信到眉山“向么爸请和”。二十八军邓锡侯和二十九军田頌尧和刘湘早有盟约，今见刘文辉节节胜利，认为如果刘文辉打垮了刘湘，全川各军都将不能存在。于是，趁二刘战斗方酣之时，出其不意地以黄隐、曾宪栋、董宋珩三个师由仁寿籍田铺袭击刘文辉后防，在杨柳场与二十四军接触；同时以二十八军第三师陈鼎勋率部由简阳侧击仁寿，在仁寿与二十四军接触。刘文辉部林云根师的陈鸣谦旅又在开抵北斗镇后倒戈，归附刘湘。陈鸣谦是仁寿县宝马场人，原为刘成勋的师长，刘文辉兼并刘成勋时，陈投靠刘文辉。由于刘对陈不信任，将陈缩编为旅长，陈的团长李玉书、赵佩三却提升为旅长，刘又派亲信到陈旅任团长，对陈监视，凡事刁难，引起陈的不满。陈鸣谦是武备

生，四川老军人，他在四川速成学堂任队长时，刘湘是他的学生。由于这些重要历史关系，陈在二刘之战的关键时刻抛开刘文辉，投靠刘湘。由此，刘文辉部腹背受击，军心不稳，不得不接受刘湘提出的和谈条件，这才结束了惨烈空前的二刘“荣威大战”。

仁寿县境是二刘荣威之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一度时间竟成兵山一座。在战争过程中，不论谁胜谁负，群众的生命财产都遭到严重破坏。据当时北斗镇教育委员、原安属中学校长王少县向县府呈称：“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六月，有脱离二十九军之寇旅，突然来到北斗镇，致商人断市，旅客往来稀少，前后计驻兵五十日，北斗损失甚巨。九月，二十四军来场驻扎；农历十月，李家钰、杨森、罗泽洲三部开来北斗十一月，北斗沦为战区，所遭蹂躏甚于寇旅百倍。本场前后驻兵约一年之久，本区十场同样遭殃，是全县七十二场中损失最大的场。”籍田铺团正苏纯铨向县府呈称：“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四军到籍田铺驻扎达五个月之久，军食、军用所需全由民众承担，民众十室九空。冬月二十六日，二十四军退走眉山，二十八军、二十九军齐驱并驾跟踪追至籍田，有董宋珩、黄隐、曾宪栋三个师兵力，在籍田铺又驻扎十五天。籍田无力供给，于是三个师部联名，飭令团保局筹集粮谷，并把历年积谷卖空。当时，兵士凶横，进行抢劫；还派兵到邻近各场，持枪勒令团保局负责筹集，对有关人员进行敲榨勒索，或直接窜入富室搜索。籍田铺先后驻兵六个月之久，以致农村凋敝，百姓度日如年。”目睹者，亲见罗泽洲、李家钰两部在周龙场时，每天除派士兵随团保人员下乡催粮款外，还在乡下杀猪、抓鸡、拉夫，

甚至奸淫妇女。战场上的伤兵抬下来，要强迫征用农民的棉被，脓血污垢染透棉被后，任意抛弃了事，谁也不敢吭声。败兵撤走前，凡经过的场镇，都要窜进民房挨户撬箱扭柜，把略微值钱的衣物统统拿走，当时即使有点权势的人家，也难幸免。一壮年农民被拉去当伕，由于行李过重，体力不支，被士兵捅一刀后才被放走。其他挑夫苦告哀求，也要拉到顶替者后才会放行。

僚人在仁寿地区的活动

阙 兴 建

仁寿境内，不少山岩上有人工凿就的石穴，其中石床、石桌、石凳俱全，俗称“蛮洞子”。这就是古代僚人居住所留下的历史遗迹。

僚人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之一，其名最早见于《华阳国志·蜀志》。“其宝则有璧玉、金银……之饶，滇、獠、僰、僮仆六百之富”，“……帝攻青衣，雄张獠、僰”。青衣，在今四川省芦山县。是以，远在古蜀国开明时期，四川西部和南部就已有僚人居住了。

僚人多穴居，或“依树积木而居其上，名曰干兰”。信鬼神，据说今之端公跳神，即其遗俗。以农耕为业，兼事渔猎，“能卧水底，以刀刺鱼”。“能为细布，色至鲜洁”。

“所铸铜爨，既薄且轻，易于熟食”。其部族“往往推荐长者为之王，亦不能远相统摄”（《魏书·獠传》）。上述资料说明，南北朝及其以前时期，僚人的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

展，但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仅是分散的地区性的部族。

两晋时，李雄据蜀，川人外流，仅出居荆州者，即达十余万户。因而“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十室九空，田园荒芜。李寿即位，招羊柯、夜郎僚人入蜀以充实虚隙。僚人乘势出者“十余万落”，“所在诸郡，布满山谷”，散居于“自汉中达于邛（今西昌）笮（今雅安）川洞之间”（北史·僚传》）。另据《晋书·地理志》载：西晋于蜀置郡十五，除新都一郡缺僚人居住记述外，其余十四郡均记有僚人活动情况。再据《元和郡县志》载：自晋至隋，仅资、荣、邛、眉、嘉、泸六州，僚人所居的县，先后有二十八个。由此可见僚势之盛。陵州，当时虽未全部为僚人所占有，但亦有大量僚人来此与汉人杂居。如史载“陵州僚”，“铁山僚”，“东山僚”、“木笼僚”等即是。今遍及县境的僚洞，即可证明。

杂居于陵州的僚人和汉人通力合作，共同生产劳动，对发展陵州山区的经济和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僚人凿穴而居，能吃苦耐劳，因善掘井，今民间仍有“蛮子会打井”之说。他们是开发陵州地区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太平寰宇记》载：始建七井：赖子、赖胡儒，赖渡……；仁寿七井：赖伦、赖母、茫、赖郎、依郎……；还有仁、井间有赖下六池。另据《元丰九域志》：仁寿有赖钺镇，拥斯茫水；井研有赖玉、赖藕、赖社、赖漫等镇及茫溪。所有这些井名，镇名、河名，显然不同于汉语称谓。据四川大学历史系任乃强教授研究，赖即僚语“盐”，“茫”即僚语“小河”。这些冠以僚语的地名、井名，足以证明在开

发该地经济和文化，特别是在开发盐业的过程中，僚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僚人善铸铜器，这对开发铁山地区的冶炼业不能毫无影响。僚人能为细布，对促进仁寿地区的手工纺织业的发展也有一定作用。

但是，中国历代的贵族、汉官、豪强和地主，对于少数民族，总是沿用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的政策。加在僚人身上的高租重押，苛捐杂税，徭役军差，多如牛毛，甚至被掠夺为奴隶，象牲畜和商品一样进行买卖，象礼品一样进行馈赠和赏赐。以致“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僚口者多矣”。（《周书·僚传》）“大狗一头，买一生口”（《魏书·僚传》）就是当时一个僚人的价值。更为残暴的是：“肖衍梁益二州岁岁伐僚以裨润，公利颇借为利”（《魏书·僚传》），“太祖平梁益后，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口以充贱隶，谓之压僚焉”。（《周书·僚传》）无止境地对僚人进行血腥屠杀。当时的僚族人民，确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不能不激起僚人的反抗和斗争。据历史记载统计，自东晋僚人出山至五代的六百余年间，四川僚人大规模起义共四十八次，其中与陵州境内僚人有关的二十三次，战争直接在今仁寿县境进行的九次，这就是梁大同六年（540年），陵州僚作乱（《读史方輿纪要》）；西魏恭帝三年（556年）陵州木笼僚起义（《周书·陆腾传》）；北周明帝初（557至558年）陵、眉、戎、江、资、邛、新、遂八州夷夏及合州张渝兄弟起义（《周书·陆腾传》）；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铁山僚起义，抄断内江路，致“使驿不通”（《周书·陆腾传》）；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嘉、陵州僚人起义，占领州城，州人避难山上（《隋书》）；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陵

州僚人起义；贞观七年（633年）嘉、陵州僚人起义（《通鉴》）；唐上元二年（675年）僚陷嘉、陵州（《旧唐书·商廷传》）；后蜀孟昶广政十九年（956年）陵、荣州僚人起义等。经过这些频繁地抗争和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迫使各代统治阶级不得不正视现实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除继续加强武装镇压外，首先强化统治机构，增置州、郡、县、镇各级政权：如“梁肖范以蒲水口立栅为城邛州以备生僚”；

“梁武帝讨定夷僚乃立戎州”；“周武帝攘夷御僚立洪雅镇”；“隋文帝平夷于此，首置汉源镇”……等：其次是迁，废治地以避僚锋：如迁冶官县出仁寿境而向当时政治军事力量较集中的铁山西部转移；平羌县“因夷僚侵没移于今理”。（注：理，指治地所在地）（上引资料，均见《元和郡县志》）再其次是为抚慰僚人，专门增置一些县镇，如威远、龙水，绥山、沐川，罗目，和义等县即是。另外还采用怀柔政策、以安抚欺骗僚人，缓和斗争。如早期仁寿县名“怀仁”、“普宁”，置“和仁”郡，“和义”县等。这些郡县的命名，即表其蓄意。所有这些，不能不认为是僚人通过斗争，在政治上所取得的胜利。

隋唐以后，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统治力量的加强；也由于僚人和汉人杂居，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互通婚嫁，部分僚人逐步汉化，融合于汉民族之中，另一部分也和其他兄弟民族相融合，对立的斗争逐步趋于统一。宋元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僚族，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他们在历史上——特别是在仁寿县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理应予以肯定，不能听其湮灭。

民国时期仁寿农工商业概况

查学勤

仁寿幅员广袤，据民国三十二年统计总面积达2516平方公里35平方公尺。人口众多。民国三十年就有926,246人。历来以农业为主，全县人民除少数从事手工作坊和经商贸易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以务农为生。自清至民国，仁寿的农业，工业、商业都颇落后，民国建立初期，在新文化、新章程、求进步、倡建设的运动影响下，仁寿的农、工、商业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而有所发展。但因县境偏僻，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农、工、商业仍墨守陈规，改进不大，至蒋介石当政抛弃了孙中山先生之建国大纲与建国方略，背判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实行独裁专制，使中国仍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军阀连年混战，内战外患频临，因而农、工、商业每况愈下，百业萧条，阉阎凋敝，民生日蹙。兹就民国时期农工商业概况，分述如下：

一、农业

县境地方偏僻。水陆交通均颇落后，（建国初不少初到仁寿工作的外来同志，称仁寿县是“小西藏”境内多属浅丘，少数深丘，极少平坝，无巨埠大镇，虽辖六十四乡、七十余场镇，但皆为乡民赶集以交换布帛菽粟日用所需物品之所。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总计全县共有烟户137,589户，其中居场镇者占百分之二、三，居农村者占百分之九十七、八，乡民主要以农为本。其风俗俭朴，不尚奢侈；质朴

勤劳，不惮艰苦。每值农忙季节，男耕于田，女种于山，少壮老幼，群趋其事，习以为常。惟因科技文化落后，囿于成习，无所改进，旱涝丰欠，只有听命于天。风调雨顺的年辰，老百姓的最低生活都难维持，一遭灾害，日子就更难熬了。虽然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有不少经验，但因长期遭受压迫剥削，不可能交流传播，如种子 土壤选择培育，耕作技术改进，肥料器具制造等等，故终究不能增产增收。一遇各种灾害，老百姓束手无策，不是祈神占卜，便是坐以待毙。四川在民国以来的二、三十年中，兵戈迭见，内讧不休，赋税频加，徭役烦重，拉丁派款，民不安枕，各级贪官污吏，遍地土劣豪绅，剥肤吸髓，其惨状目不忍睹。县距省会成都近，成都每发生一次战役，仁寿无不遭受重大损失，农村破产日剧，人民饥饿日增。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大旱，饿莩在途，饥民满道，千百成群，夥吃大户者，此起彼伏，弃儿卖女，杀人而食，惨状频见。政府虽然偶尔施放赈济，但量小数微，又遭不肖员吏之亏蚀，杯水实难救车薪。就是在平常年景，没有什么大的天灾人祸，全县田共561,774亩（民国三十二年土地呈报数），以每亩收谷450斤估计，年可收谷252,798,300斤，舂碾成米只得七成，即年产米176,958,810斤，又土共842,611亩（与田面积来源同）大春一季，约以四分之一、五种棉蔗，四分之一、五种红苕杂粮，四分之一种包谷，以每亩收包谷三百斤计，年可获包谷63,195,825斤。小春一季，约以四分之二种豌豆及其他零星作物和少数轮荒地，四分之一种菜子，四分之一种小麦，按每亩收麦350斤计，年可收小麦73,728,462斤，统计田土总收米、麦、包谷年可获313,883,097斤，内除包谷用

来饲畜造酒消耗半数31,597,512斤外，除去一年数征的赋税不计，供人民食用的也年只282,285,585斤，以全县人口826246人计，平均每人每年得米、麦、包谷合304斤，如按人平每年基本口粮430斤计，相差甚巨，全赖土地所产红苕为大宗以及蔬菜瓜豆等兼作食品补充以资饱腹。输出的农产品主要是棉花、土布，次蔗糖，再次兰靛、白蜡、蚕茧等数种，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统计：县境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年产量，除粮食外，棉花约4,800,000斤，土布约80,000匹（每匹长八丈宽一尺二寸许），土纱100斤万左右，红糖300,000斤以上，白蜡500担左右，靛1000担以上。民国十四年以前，烟禁废弛，所产罂粟不少，也是输出物品之一，后因禁种鸦片，到民国二十四年，即绝种。再如牲畜竹木土产日杂，虽然是农家的一些副产副业，产品产额虽多，只是主要供境内之需要，作为商品输出者，实属无几。

二、工业

本县工业最为落后，民国时期根本没有现代化工企业，工业产品无足称述，诸如丝、棉、纱、布、盐、糖、瓷碗、煤炭、石灰等也有相当产量，不过都是一些家庭副业，手工作坊以及落后的手工工坊厂矿而已。清末民初仁寿的丝在四川较为有名，其柔纫力最强，成都丝织家，都竞相争购以为经，前清年间缫丝用的是光绪末年所造大车，自县设立蚕桑局后，就是提倡改用小车缫丝，小车缫的丝，品质优美，携至成都展览会比赛，曾获得头等奖。民初县境观音桥乡设有一个新民丝厂，禄加乡设有一个全益丝厂，这两个丝厂皆用小车缫丝，所缫的丝，品质优良，运销成都、嘉定、重庆、上海各商埠。不久，禄加乡的全益丝厂因上海丝价猛跌，该